



AI時代，如何守護「知識主權」

吳志良

二〇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開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題新聞發布會。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辛國斌在會上透露，我國人工智能已經基本貫穿研發設計、生產製造、質檢運維等全鏈條，已有近二百項人工智能關鍵標準成功研製。而在今年三月發布的「十五五」規劃綱要中，國家已明確提出「全面實施『人工智能+』行動」，全方位賦能千行百業。預計到「十五五」末，中國人工智能相關產業規模將突破十萬億元。

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我們的世界。生產力的躍遷、產業形態的重構、治理方式的變革和生活方式的改變，一切都在加速。但在這片熱鬧之中，有一個問題值得我們停下來認真思考：當AI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滲透各行各業，誰在定義AI的知識框架？誰在引導價值觀念的重塑？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在二〇二五年「前海智庫院長對話論壇」上，給出了一個振聾發聵的判斷。他指出，AI帶來的挑戰是全方位的，其中尤為值得警惕的是「被殖民」的風險——「當前AI大模型的『餵料』大多來自西方，這可能導致非西方國家喪失信息主權與思想主權，陷入前所未有的被『思想殖民』。」

這番話並非危言聳聽。

今天的全球AI訓練數據，高度集中於西方語料。當大模型以西方知識體系為主體框架來理解世界，當AI系統以外部標準來界定「何為正確」「何為好的治理」，一種比芯片斷供更為隱蔽的依賴便悄然形成——它在潛移默化中重塑一個國家的認知基座和價值觀念的底層邏輯，甚至在重構人類的知識圖譜。

今年三月，全球人工智能領域頂級學術會議NeurIPS（神經信息處理系統大會）在其二〇二六年度徵稿指南中新增一項條款，規定「受美國制裁機構名單中的組織將被禁止參與投稿」。僅以「中國」為篩選條件，受影響的實體就達八百七十三家——華為、商湯科技、曠視科技、中芯國際、海康威視等國內核心科技企業，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三大運營商，以及部分受制裁的高校和國家級重點實驗室均在列。這些機構不僅無法以自身名義投稿，其資助、委託或合作完成的論文也將被直接拒絕，受影響人員還被排除在同行評審、編輯等學術服務之外。消息一出，中國計算機學會發表嚴正聲明，表示堅決反對；中國科協隨即宣布停止受理學者參加NeurIPS的資助申請。

這一事件暴露了一個冰冷的事實：知識主權的爭奪，已經從學術殿堂延伸到算法底層。真正的技術自主，從來不只是「有沒有芯片」這麼簡單，而是「是否擁有定義技術路徑

的能力」。中國四十多年的現代化實踐，蘊藏着豐富的治理經驗和文明智慧，但尚未充分轉化為具有足夠國際影響力的思想資源和可計算的結構化知識數據。誰來定義「何為好的治理」？誰來決定「何為正確的邏輯」？這些問題的答案，正從學術討論轉移到算法底層，構成新型的「認知基礎設施」競爭。

再把目光轉向中國智庫。自二〇一五年《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出台以來，中國智庫數量已躍居全球第二。然而，「庫多智少」的結構性矛盾同樣突出——優質知識供給嚴重不足，大量研究停留在套用西方框架、追逐短期熱點的層面。更為嚴重的是，在傳統知識環境下，資料整合、信息梳理本是有門檻的專業能力，而今這類能力正在被AI迅速規模化複製。智庫面對的已不僅是「發展」問題，更是迫在眉睫的「生存」問題。

那麼，在這場關乎國家戰略安全的競爭中，澳門能做什麼？

澳門雖長期受西方影響卻始終保持中華文明主體地位，四百多年的「和而不同、多元一體」的融合經驗，使澳門天然具備講述中華文明體性的說服力。今年八月，《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三個五年規劃（2026-2030年）》正式公布。澳門「三五」規劃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按「1+4」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策略布局四大新興產業，



▲九月二十六日，浙江杭州，多名小朋友和人形機器人進行競速比賽。

中新社

高新技術鎖定數字科技、生物醫藥、集成電路及航天科技四大優先方向，並關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前沿細分領域。

澳門雖小，但可以有大有擔當。澳門擁有中葡雙語法律體系、自由港地位和廣泛國際網絡。在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征程上，澳門可從學科建設、智庫服務、文化傳承到國際對話等方面發揮獨特作用。澳門智庫的使命，就是將中國現代化經驗、特別是「一國兩制」的實踐轉化為具有國際解釋力的理論資源和結構化知識數據——在AI時代，為中華文明的數字化存續與傳播築牢根基。以豐富的中西並

舉、古今同在歷史文化底蘊資源，以「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為根基，以中葡平台和國際網絡為紐帶，澳門完全有條件成為守護知識主權的前沿陣地。

AI時代，知識主權不是遙遠的概念，而是關乎每一個國家認知基座的現實問題。當大模型的「餵料」決定了一個民族如何理解世界、如何定義自身，誰掌握了知識生產的底層邏輯，誰就掌握了未來。從這個意義上說，澳門守護的不僅是一座城市四百多年的文明傳承，更是中華民族在智能時代的自主知識話語權。

澳門雖小，可以有大有擔當，也應該義不容辭，有所作為。

從簽贈本看葉高文緣(下)



李廣宇

葉靈鳳誠邀高伯雨同赴佛堂門之遊，除了私交甚好，更因為同氣相投。尤其是對於文史掌故一途，可說惺惺相惜。在《讀〈聽雨樓叢談〉》一文中，葉靈鳳說：「喜歡讀叢書的人，對於文史掌故的著作，總是特別感到興趣的。我正是其中之一。」「在朋友之中，精於這一門學問的，自然要推高伯雨兄。」他還說：「我以為，寫掌故文章的，可以不避道聽途說。因為不寫道聽途說，內容便要缺乏趣味；但是又不可不辨道聽途說，因為若是不能辨別誰是道聽途說，誰是真實事實，那就失去了掌故文章的價值。《聽雨樓叢談》作者所寫的這類文章，就有這樣的好處。」

葉高二人，平日不乏往還，最常見的就是贈書借書。高伯雨翻譯的《紫禁城的黃昏》出版後，就曾簽贈葉靈鳳。葉氏日記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四日有記：「高貞白摘譯《紫禁城的黃昏》出版，見贈一冊，原本英文是我借給他的。」盧瑋瑩對此箋註說：「高貞白先生也向我提及此事。」算是一種旁證。許禮平《掌故家高貞白》一書說：「是由修讀西洋文學的女兒，從圖書館借來。」怕就埋沒了這一段佳話。葉靈鳳在收到贈書後，次日即開讀，日記裏說：「讀《紫禁城的黃昏》。高君有些註釋，對

照原文讀起來，增加不少興趣。」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五日，高伯雨還邀請葉靈鳳到美蘭茶室喝茶，贈送他為黃濬整理出版的《花隨人聖庵摭憶補篇》（一九七〇年香港大華出版社出版），又補足《大華》二期。《大華》是高伯雨於一九六六年三月創辦的掌故半月刊，第一期就曾惠寄葉氏。葉靈鳳曾寫過一篇《讀〈大華〉創刊號》，自述收到雜誌後，「使我很舒服的消磨了一個夜晚」。他認為，「像《大華》這樣，為談掌故而談掌故的刊物，不存什麼成見，內容自然會比其他的更為可觀了」。在這篇文章中，葉靈鳳透露了曾經向高伯雨借閱《花隨人聖庵摭憶》抄本的情形：「前幾年，我曾將《花隨人聖庵摭憶》翻過一遍，原書就是向《大華》的主編人林熙先生借來的，還是抄本，據說這是最完整的本子，比目前市上的排印本要多了十多萬字。」花隨人聖庵主人是黃濬，其父黃彥鴻為光緒進士。黃濬畢業於京都大學堂譯學館，曾留學日本，後任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一九三七年因向日本洩露國民政府江陰封江軍事機密，被以叛國罪判處死刑，與其長子一同被處決。他的「摭憶」記錄晚清民國朝野掌故，史料價值極高，陳寅恪對其曾有「未可以人廢言」之語。葉靈鳳亦有相似評價，他說：「如果不以人廢言，……倒是頗有些資料的。」



【大公報人物誌⑭】



李春陽

李春陽

李春陽

李春陽

李春陽

李春陽

李春陽

李春陽

彭子岡



▲彭子岡。
資料圖片

一九四一年三月至一九四四年六月，她為桂林版《大公報》採寫了近百篇「重慶航訊」，被稱為「重慶百箋」，揭露了重慶達官貴人的奢靡，記錄了抗戰時期的人生百態，是那個年代桂林版《大公報》的著名品牌。

一九四五年發表在《大公報》上的《毛澤東先生到重慶》是她負有盛名的報道。她以細膩的文字，將毛澤東刻畫成「來自鄉野的書生」，顛覆了國民黨對於共產黨的負面宣傳。「他平靜、沉着，與人交談自然、坦誠，常用語是『和為貴』，有時也很幽默、風趣。他喜歡抽煙，會跳舞，處處顯出大政治家的風采。」

彭子岡與浦熙修、楊剛、戈揚並稱為抗戰時期新聞界的「四大名旦」，又與浦熙修、楊剛並稱新聞界「三劍客」。

一九四六年彭子岡和美聯社記者同赴張家口解放區採訪，寫《張家口漫

步》於《大公報》連載，「城市秩序井然，處處洋溢着民主氣氛，人民安居樂業，作家、學者們都心情舒暢地積極工作。」

她對於美國大兵強姦北大女生「沈崇事件」的報道、對於日本女間諜川島芳子的報道，無情地鞭撻了帝國主義面目。

新中國成立後，她歷任《進步日報》（原天津《大公報》）和《人民日報》記者，一九五五年起擔任新創刊的《旅行家》雜誌主編。

採訪沈從文、吳祖光、姚雪垠、徐遲、黃裳、靳以等，約他們寫稿、為他們寫稿，把雜誌辦得有聲有色。《旅行家》與《新觀察》一道成為那個時代讀者最喜愛的刊物。

彭子岡在一九五七年被首當其衝劃為「右派」，後被下放勞動改造。一九七九年獲平反。

徐鑄成曾經說，「我覺得子岡的文章，除立場、觀點正確外，文如其人，爽直、豪放。而細密處絲絲入扣，綿裏藏針，皮裏陽秋，所以當時吸引廣大讀者，篇篇耐人尋味，是富於戰鬥效果的傳世之作。」

名記者戈揚曾說，「使我納悶的是，彭子岡在國統區戰鬥了十多年，她的那支筆，她的採訪行動，曾使反動派喪魂失魄，人們總認為她是一個多麼厲害的女記者，原來卻是如此的樸實、誠懇、溫柔、可愛，有時還有點傻乎乎的，天真得像個孩子。」

一九八八年彭子岡去世，農業經濟學家、翻譯家葉蕪莊寫過一幅輓聯：「有兩隻慧眼，於重重黑暗中，明察秋毫，鼎鼎大名垂青史；握一管神筆，從處處間陳裏，寫出雄文，閃閃烈焰照人間。」

中秋國慶喜相逢



伍春軒

每年中秋佳節，月圓之夜，或前或後與國慶節相逢。自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祖國之後，每年十月一日，香港市民多了一天公眾假期，而在香港中秋節是當日不放假，翌日放假一天，取意是在節日當晚團聚歡慶，第二天休假，好好休息。

今年中秋節比國慶節早不到一周，而去年則剛好相反，國慶節早幾天。香港不像內地有國慶黃金周，若再加上中秋節，會有一個小長假，各省市民眾都可以趁着秋高氣爽盡情放鬆，國內外旅遊走走。但是，香港人其實一早就計劃好，看看能如何利用好這兩日的假期，若可以與周末相連，也不失為一個外遊好時機。

香港的中秋，白天仍是艷陽高照，氣溫大都會至三十攝氏度左右，晚上也不算太涼

快，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國慶。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七周年，香港也一如既往推出了很多國慶日優惠。香港市民及遊客們都能受惠，諸如：免費乘搭港島電車及天星小輪，而港鐵則推出七萬七千份禮物給乘客，國慶賽馬日馬場免費入場，所有電影院票價五折，還有各大商場及一些食肆，都有七七折消費優惠，再加上國慶日當晚維港的煙花匯演，很具吸引力。內地及海外遊客蜂擁而至，今年香港中秋國慶節假日，又是旺丁旺財。

中秋與國慶喜相逢，而筆者也在雙節中，與久違的昔時同學在港重逢。

記得在今年五月母校百周年校慶晚宴上，遇到了很多幾十年前的中學同學。當晚大家重溫青蔥歲月，共話同窗情誼，並舉杯

致敬恩師。不過，唯獨有一位筆者昔日知己卻未見出席當晚活動。後來經過另一位在晚宴中遇到的舊同學輾轉得知，她中學畢業後考入台灣大學讀醫，學業有成便留在當地執業。現在除了是一位懸壺濟世的女醫生，更是三位孩子的母親，可能當時忙於工作未能來港。

雙節前由滬放假回家，獲校友會好友告知，她剛好也回港探望雙親。於是三五老友便相約於銅鑼灣時代廣場茶敘。赴約前思緒難免回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大家在學校的一些場景，當時筆者是男社長，她是女社長。雖然大家不同班，但在課餘時間經常在一起，為社際各項比賽而組織隊伍，彼此合作無間，互相情意遞增……唯自畢業後，好像也沒有怎麼聯絡，加上那個時代也不像現在

通訊這麼發達方便。

九月三十日，終於與闊別三十八年的舊同學再次重逢。雖然大家外形都有不少變化，年歲的增長對於每一個人來說都是公平的。她胖了些，但風采依舊；我呢？她說，好像矮了些……大家不禁都笑了。四位昔日舊友就這樣於中秋後，國慶前，在旗海飄揚的銅鑼灣聊了一整個下午。由兒時回憶到各自近況，由家庭瑣事至各地時事，由自己的際遇聊到孩子的成長……四個多小時下來，卻還未聊完。她相約大家明春帶上家人去新北市遊玩重聚。

最後，望着大家離去的背影，總有些依依不捨，尤其是她，子伊。期待着明春之約早早到來，畢竟人生能有一段近四十年的情意，是何其難能可貴！